

跨越太平洋：家族、国籍及资本运作

——海外华人群像及其“华性”解读

〔美〕翁爱华 著，张晓萍，贺迎枫 译

摘要：穿梭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之间的海外华人的行为实践，打破了学界对“华性”的单一意义认识。自欧洲殖民资本主义时代起，远离故土、离散分布、暂居性、混融性，成为华侨文化塑形中的关键因素。海外华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文化适应过程中，形成了弹性的习俗和实践原则，其突出表现为一种试图把移民和资本积累结合在一起的国籍选择策略。换言之，弹性国籍的选择其实深受全球市场状况的影响。

关键词：弹性国籍；移民；资本积累

一、不稳定的华性

在加利福尼亚，“硅谷式离婚”已经导致了新一代华人移民中间 1/5 婚姻的破裂。举个例子：一对“典型的”华人夫妇——丈夫是工程师，妻子是会计——他们住价值 50 万美金的房子，两个孩子上名牌学校。他们刚在 Tahoe 湖投资了第二处房产，用于度假。然而，妻子提出离婚，但并不是因为丈夫有了外遇，她抱怨说：“我的丈夫白天在办公室里用电脑工作，晚上 8 点回家，晚饭后接着又坐在电脑前面……我简直就是一个‘电脑寡妇’。他从来没有问过我在做什么，也没有问起最近家里的情况。”

在这个故事里，一些后现代因素不停地碰撞着，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因素包括移居（如生活在西方世界里的亚裔人），离散（如移民和离婚造成的家庭破裂），差异性（如男、女的不同），以及非永久性（如日常生活事务的安排）。如果这报道不是关于华人的话，它们只不过是过眼新闻。但对我而言，这一后现代的快照是对学术界所描述的华人本体、家族以及文化实践的一种反拨。

许多有关华人主体的学术研究都受到东方学的影响，而所谓的东方学将中国文化看成永恒不变的。“华性”这种本质化的概念一直为学术研究所关注，华人既有的民族渊源、单一的历史以及某种“文化核心”为其主要共识。虽然近年

来许多学者试图改变这种静态的华性研究，但不幸的是，他们仍然将“华性”的分析研究限定在华人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大背景之下。但我所要表达的观点是：被识别为“华人”者存在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中，即使当他们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时，他们仍继续保持着其文化的独特性。广义的东方学研究成果是基于历史学范畴的，也就是说学者们坚信伟大的、深邃的中华文化的单一性。而同时，不少青年学者和女权主义者则一直致力于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实践中一些更为复杂的、从历史学和地缘政治学角度上来说更为合理的解析。

有关移居、混融和资本运作的故事扩展了华性的内涵。华人主体参与到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之中，那么，这些有着差异性的形象是如何反映出这一变化的？如今，海外华人在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在全球资本运作中，进行着跨境经贸往来活动。那么，他们又是以什么方式改变着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和阶级定位策略的？

Edward Said 将东方主义者当作西方霸权主义世界中沉默的参与者，而与之不同的是，我讨论的是亚裔主体的能动作用——他们在全球化导致的经济文化面貌改变中，有选择地参与了东方主义的活动，颠覆了在国际环境下的民族自我和非我的支配概念。

作者简介：翁爱华（Aihwa Ong），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加利福尼亚 伯克利，CA 94720）；张晓萍，云南大学工商管理及旅游管理学院教授（云南 昆明，650091）；贺迎枫，云南省旅游学校讲师（云南 昆明，650221）。本文节选编译自 Aihwa Ong 的《弹性公民权——跨国的文化逻辑》（*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一书第 4 章，该书于 1999 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

Summary of “*The Silicon Valley Way of Divorce*”, *Overseas Scholars' Monthly* (Taipei), January 1991, pp. 71.

如今，弹性理论盛行于工商业、劳动力和金融市场；技术推动的发明创新影响了认知人和规范人的不同方式，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在国际环境中表达自我和控制自我的方法。结合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我们看到，国际经理人和专业人士显然比旅行者和普通移民拥有更多的物质和象征性资源，他们可以按照对他们有利的方式，适应各国的文化差异而灵活地选择自己的国籍；但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并不是完全自由、毫无约束的，而是受民族国家及资本市场的控制与塑造。

为了理解国际经理人阶层的策略和行动，我们必须把他们前提性地定位在一个由现实和权力所构建的体制之下。Michel Foucault用“体制”这个词来指试图把权力关系常规化的权力/知识系统。通过展示科学、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某些“真实性”，这些权力/知识体系界定并规范着行为主体，使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常规化。本文所讨论的体制，是华人的亲属关系和家族关系体制、民族国家体制，以及市场体制——所有这些体制给华人主体提供了制度背景和权力范围，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据此（重新）自我定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文化适应过程中，海外华人形成了弹性的习俗和实践原则，其又突出表现为一种弹性的国籍选择策略。所谓“弹性国籍”，指通过各种家族的、经济的规则，借此规避或利用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而采用的主体本土化策略。因此，在分析中，我们不能把家族体制同国家法规和资本运营法则相剥离开来。所以，当我谈论弹性国籍时，我也在谈论由民族国家、家族、资本的实践而体现出体制的不同形式，它们相互交汇、彼此影响。

二、海外华人的关系及其家族机制

海外华人的现代性是从东亚和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华人移民中间发展起来的，它与日常实践中的“中庸”精神有所不同。在城市通商口岸和殖民飞地里，华人主体面临着政治上不同程度的剥削压迫和激烈的生存竞争，发展出一种针对劳动者组织、家族实践、家族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联以及政府相关政策法规的应用性实践法则。通过在海外形成的利益纽带，华裔商人和工业家族重新自我定位为全球贸易的主体，而不去一味单纯地效忠祖国。

在后殖民时代，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一直在怀疑其华人公民的政治忠诚度，其多半是因为那些

公民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广泛的海外联系。华人的文化政治根据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在新加坡，政府以儒家教育来反复灌输忠诚于国家的理念，而这种忠诚类似于孝道。但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观念则吸取了以多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模式。

华人小心地利用着关系人脉和实用主义的家风，在帝国边缘建立家族生意。因而，这些习惯、态度和规则并不是一些本质化的“传统的”华人特质的简单延续或传承。客观地，东南亚华人的关系网络是历史的偶然现象，作为一种（后）殖民习性，这种倾向和风气，强调实用主义、关系人脉、亲身实践的重要性、性别和年龄等级，以及居住国当地特定民族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模式。这些海外华人的习俗确保了移民家族几代人的生存，其独特的中华特色没有受到殖民（然后是后殖民）国家的风俗习惯的太多影响。

在谈论海外华人文化时，往往会提及“关系”问题。“关系”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亲属关系和族群凝聚力，但是，一方面，“关系”的存在有益于家族生意的联系，促进家族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海外华人的家族制也存在着掌控妇女和穷人的权益的情况。但在日常生活中，“关系”的人文色彩被普通民众、生意人以及文化沙文主义者过分夸大了，从而把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了。的确，关系体制和网络已经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次级订单生产企业/加工企业中激增，许多华商通过为全球跨国公司提供半成品而进入了轻工业制造领域。最近几年，关系网也成为海外华人资本和中国大陆企业之间签订半成品订单合同/加工合同的渠道。因此，“关系”是一种实用主义（促进了跨越政治边界的灵活度和资本、人力的流动性）和人文主义（在大陆“帮助”亲戚和老乡）的混合物。一方面，“关系”可以同爱国主义情感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海外华人投资商也看到了中国大陆巨大的资本及劳力市场里存在的盈利契机。因此，尽管他们将家族移民海外，但各种关系又让他们把资本送到中国。

我把在本家族范围内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经济范围内、为利益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和与之相应的家族主体理性的、规律的实践活动称为家族机制。可是，家庭的生物政治总是受到更广泛的

David Harvey在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lackwell Publishing出版, 1989) 一书中, 把我们这个时代看作是一种“弹性沉积物”, 但他低估了文化对于物质世界的塑形作用以及政治经济对于文化的影响。

Paul Rabinow, *French Modern: Noms and Form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pp. 9 ~ 10.

政治经济环境的约束。

三、民族特征和生物政治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始，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已经寻求在西方国家的居留权。但是，随着亚洲国家财富的增长以及西方经济的相对衰退，许多华人专业人士宁愿继续在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工作，而把家安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大不列颠。可是，他们申请外国国籍受到了西方国家以资本和民族为门槛的移民政策的限制。

成为一国公民的具体条件是 Foucault 所提到的“生物政治”的结果：国家把国民按人口划分为年龄、民族、职业等不同的主体以及有性行为 and 繁殖力的个体，以确保国家整体的安全和繁荣。生物政治理论认为，政府能通过一种行动政策而不是按社会规律来构建并确保市场需求。例如，香港地区的移民行为和状况，就体现了生物政治的原则。

对于香港地区，英国政府一直在政府的市场干预力和商业市场的自主性之间改变着自己的政策，借以维护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关于香港人移居到英国的问题，就必须在政府的主控力和国际资本主义之间辩证地加以考虑。

英国的移民政策从结构上决定着社会阶层地位和不同种族之间的联系，于是，典型肤色上的差异转换成为建立于不同潜在移民群体的资本和劳动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层。“二战”后的移民法案通过继续把“有色人种”移民从英联邦国家中排除出去，从而使得种族差异被制度化。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由于公众的压力，英国保守党政府限制了有色人种的移民，撤消了持英联邦护照的有色人种进入英国本土的权利。几年后，同样的政府把入境权和居留权授予了来自南非的几百万“白”人。政府的一份白皮书把该行动解释为：因为英联邦国家移民人数的增加造成了社会压力，而要避免“恶性种族竞争”的话，就必须解决移民的问题。尽管移民法的条款并不明确地偏向种族主义，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差异以及假设他们对种族冲突所起的影响作用，促发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国际族群，并且在制度和体制上表现出来。

在这种国际族群的形成中，尽管来自香港的华人是有色人种，但因为他们在海外资本积累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们有目共睹的驯良品质，他们明显不同于来自非洲和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的移民。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政府限制了移民规模，使得香港移民只能从事餐馆接待和服务业。同时，几千名学生被父母送往英国接受高等教

育。到了 20 世纪 80 ~ 90 年代，又产生了移民潮，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西方国家。很快，香港的月均移民人数达到 1 000 人，这使得作为英国利益投资重点的香港金融市场处于信用危机之中，当时的香港政府为此大伤脑筋。

英国于 1990 年修订了移民法，把英国国籍授予一些香港人士，姿态性地阻止香港的移民风潮，并希望借此稳定各界对香港经济的信心。此时，为市场利益服务的生物政治标准再一次决定了谁会被授予国籍。一条国籍法案仅把完全公民权或“居留权”授予 50 000 个香港精英人士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这一特殊的移民群体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是因为他们与英国政府、企业或其他一些组织有着各种联系。尽管英国工党对这一法案过分强调移民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的“精英化”做出了批评，但它并没有指出国际资本的利益是如何定性种族之主体的。

中国政府不断地向已经移民国外的香港人呼吁，要他们考虑回国，为其祖籍地的繁荣而工作。同时，承诺保持香港的社会制度，希望由此留住香港的民众和民心。与此不同的是，英国政府承诺给予港人国籍，想借此确保英国在太平洋沿岸经济区中的利益。

许多香港人热衷于在中国工作，但谋求外国国籍。他们夹在英国的种族主义和中国人的民族忠诚思想之中，在英国日渐削弱的经济力量和亚洲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之间，试图在全球经济的机遇和挑战之中找到自己的弹性位置，弹性资本积累辩证地与谋求弹性国民身份相联系。就像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可在百慕大之类的地方寻求免税口岸一样，富有家庭的成员不但持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和美国的护照，也持有如斐济、菲律宾、巴拿马和汤加等收入较低的小国的护照。

四、家族体制与弹性的公民身份

（一）打理家族生意

那么，如何谨慎地将家族机制和生意上、公民身份上的弹性原则结合在一起？做大生意的家族为我们提供了最典型的例子。许多豪族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香港商人经营房地产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是在那时，香港发达的制造业使得整个香港地区因出产低价的消费品而家喻户晓。在对这些豪族的后代进行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即便其家族公司已然进军海外，家族的控制体制依然非常严密。创立了公司的祖辈好比一名君主，他规范着后辈们的活动，后辈们必须接受训练，最终接管家族生意。孝道贯穿于家族财富接力的始终。温文尔雅的中年投资商

Alex Leong告诉我：“我记得，甚至当我还在（香港）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追寻我父亲的脚步做生意……去接管家族的生意，不为别人打工，不去自己创业。因为我想，对于后辈们来说，继承家族生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是由父亲建立起来的事业。对我来说，这就是头号责任……如果你的家族有自己的生意，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去为别人打工，而叫一个外人来打理你的家族生意？”

Alex来自望族，他的父亲曾在德国留学，后来举家去了澳大利亚。在那之后，他的父亲又在巴西开拓业务。最终，他们回到香港，他的父亲投身房地产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因为孝道，Alex和他的兄弟不得不顺从父亲的意愿，做父亲安排好了的事。Alex解释说，对于做大生意的家族来说，教儿子们到不同的地方去打理生意是一件很普通的事：“父辈为我们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职权和利益范围，这样兄弟之间利益就不会互相干扰，不然的话，内斗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以我家为例，我哥哥在香港工作。我则打理北美的一切生意。我们一直相处得不错，但不会混淆职权范围。”

尽管Alex说他无法想象会去做别的事，但他也老实说，有时候他会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父亲手里而感到“窒息”。Alex的小弟看到了他长兄的困境之后，拒绝在大学毕业后来家族公司里工作。这个有反叛精神的年轻人去了一家银行上班，但还是陷入了他父亲的一个富有朋友的家长式的监督之下。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人继承了家族财产而不是白手起家的话，那么他就要对自己的男性后代有更多、更强的掌控力。今天的全球经济群雄并起，危机重重，所以商业巨头大多一生都在对家族施加强大的控制力，指引并规范着儿子们的行为，儿子们被送到世界各地，为家族生意竭尽所能。

因此，主观上，移民海外的精英人士中的男性主体在为父或为子的个人角色方面被寄予了若干期望，也就是说，他必须营造、维护以父系权威或孝道为根本的家庭结构，还必须以养家糊口、扩大家族财富为己任。家族里的女性下一代成员继承了家族财富的小份额，除此之外，她们完全被排除在男性主导的商业领域之外。和她们不同的是，男性下一代成员必须一生都要保持作为家族生意里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角色。任何在家族生意中的消极做法（例如，不参与到家企业日常运作中就领取收益）都被认为是扮演着家族中女性的角色。可是，由于香港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增加，更多的男性下一代家族

成员摆脱了这种传统的束缚，开始自力更生，也有年轻女性已经接管了家族的生意。但家族体系传统上还是依赖男人，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族里，如果女婿证明了他对家族的忠诚度的话，也可以替代儿子的角色。

（二）旅美家族

早期进入美国的华人移民大部分是劳工，还有少量的商人。如今，中国的投资移民和专业技术移民则是熟知西方商业理念和经济规则的。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家族体制更加有弹性地在世界地理范围之内来分配家族成员经营公司生意的地域。香港的报纸把商务旅客比作“空中飞人”，意即他们总是飞来飞去，而妻子和孩子则居留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或美国。

这一变化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那正是家境中等或中上的少年人开始申请到美国念中学和大学的时候。Alex Leong的父亲经常告诫他，“你的未来在香港之外。所以你应该到外面接受教育，只要你还保持中国的习俗，还能讲中国话就行。”富有阶层把其子女接受海外教育当作进入西方社会的入场券，他们给下一代买房子，开立银行账户，投资海外地产，只希望孩子毕业后，能扩张家族在居住国的生意。

可是，许多企业家继续在太平洋两岸穿梭（因为香港的生意还是更赚钱），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则定居在北美。作为华人后现代位移的比喻，“空中飞人”这个概念也表达了弹性积累逻辑的代价，以及过渡弹性家族所付出的不易和艰辛。主妇的角色被限定在照料家庭和孩子上，如给孩子安排芭蕾、古典音乐和华文课。她们自嘲为“活寡妇”（或电脑寡妇），这种自嘲说明她们已经感受到，家庭生活因为商务旅行和生意的介入而变得完全支离破碎了。在加拿大市郊的住宅区里，这些“活寡妇”组成了一个社团，名叫“十兄弟”，以便在丈夫不在时共同分担家务。“夏天，我们不得不开始做一些如割草之类的男人干的活，冬季要铲雪。所以我们称自己为‘兄弟’而不是姐妹。”弹性国籍导致了家庭性别角色的错位，同时也打破了旧时的传统。

家庭生活和国籍的相关规定要求华人移民暂时离开妻儿，或者对其行为加以约束。这样一来，那种宣称儒家仁爱思想是华人经济成功原因的说法就受到了挑战。弹性逻辑表达了许多精英家族、豪族如何制订在国家法规框架下受益的家族全局战略，同时也揭示了这种战略的局限性和情感因素。

五、美国亚裔与环太平洋资本

美国新自由主义改变了我们对“谁是有贡

献的国民”这一问题的理解。种族冲突的历史也倾向于产生这样一种感性认识，即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群体体现着不同形式的经济政治影响。

20世纪初，华人成为第一批在美国“不受欢迎”的移民，也是第一批被认定为“不合适”的移民“种族”群体。在早些时候，华工作为廉价、勤劳而驯良的劳动力而受到资本家和传教士的欢迎，但最后却被铁路和采矿工人攻击为“不公平的竞争者”。在“冷战”期间，华人的公众形象在“好”与“坏”之间摇摆不定。20世纪60年代，华人中产阶级的出现与“非白人”（主要指生活在城市里的黑人）下层阶级形成了对比。媒体大量地用“种族的模范”来形容美国亚裔人口，认为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提升了自己的地位，因此符合“好”的标准，或至少配得上“国民”的称号。东方人顺良、勤奋、自给自足、有强大的生产力，他们的这一形象巩固了这样的一个当代概念，即亚裔种族体现了成为“好”国民的人力资本，与那些靠领取国家福利生活的人形成了对比。

在接下来的整个10年，从香港和台湾地区涌出的移民（当中有许多人是求学的学生）扩大了美国亚裔中产阶级的队伍。精英华人移民，特别是城市专业人士移民人数的增加，正好赶上了美国经济重组时期，而当时美国的经济更多地依赖技术移民和海外资本。在公众看来，亚洲新移民体现了日渐浮华的美国国民性格中传统的一面。美国接纳了更多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这显示出经济理念和实践在美国移民政策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亚洲技术和资金的注入激活了太平洋沿岸经济，同时创造了新的财富。正如其他西方国家将移民问题经济化一样，国籍已经成为民族国家财富积累的弹性工具；民族国家如果想在经济中增加竞争力的话，就必须重新审视、修改相关的移民政策和法规。

华人移民以何种方式改变了“美国亚裔人口”的文化含义？

几百年来，亚洲人和其他民族，从观念上和切身经历上，都认为自己和西方世界格格不入。现在，亚洲人在国际市场上异军突起，于是西方才能（更好地）认知“华人”。移居海外的学者运用东方学的理论将海外华人（重新）设定成眼光卓越的世界人，他们既掌握经济资本，又有人文主义色彩。香港大学前校长王赓武把居住“在非华人中间”的海外华人描述为“一种现代类型的世界文化人”，他们有理性，崇尚个人自由和民主这些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想。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以商业为主导的美国做出了反应，再次把华人移民当作新世界秩序中不

可多得的国民来看待。当然，因为全球贸易战争的缘故，这种认可也是有所保留的。在洛杉矶召开的一次关于美国亚裔人口的研讨会上，Dole食品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大卫·默多克表达了这种矛盾的观点。默多克认为亚洲是美国对外贸易战争的竞争方，正是在这一理解之下，他把美国亚裔人口的角色定位为“优秀国民”和“贸易大使”。在同一次会议上，洛杉矶城的市政委员Michael Woo（当时正竞选洛杉矶第一任亚裔市长）从另一方面，就这一问题继续加以了讨论，他指出美国亚裔人口正在扮演着“新型的混合角色”。新兴的亚洲移民（与久居美国的亚裔人口相比较）能胜任翻译、跨文化交流的使者的角色，他们的技能可以帮助美国在经济和职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他们也能在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社区之间充当协调者的角色。

六、结 论

华人企业精英走出了亚洲，他们努力维护着自身的文化形象，同时在西方社会中寻求更为广泛的认同。以商人为代表的华人移民改变了海外华人的学术形象（学术界长期将他们看作能理财、从商，以及为他人牵线搭桥）。他们让世界看到了海外华人身上并存着的人文价值和超理性主义，也为我们描绘了21世纪理想的“单个经济主体”的形象：把某地的政治束缚转化为另一地的经济契机，借助资本运作来振兴家族。

在这些精英群体中（其实也不限于此），这种超级实用主义和家族道德观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后民族主义时期人的共性。他们容易受制于资本体系，极端地说，他们是对家族（而不是任何特定的国家）效忠。旧金山酒店业主Kenny Bao解释道，他可以住在亚洲、加拿大或欧洲，“只要靠近机场，我可以住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的这番话充分地表明了资本在移民的国际性流动中起到的作用，移民的国际身份乃基于国际市场的流动性。当然，如前所述，我们在探究这一身份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弹性国民身份也有它自身结构上的限制，当事人也因此要付出一定的个人代价。

那么，什么是使得人文纽带和超级实用主义不断融合发展的真正原因？是规避国家法规的能力？是开发人际关系的技巧？还是发掘新兴、可利用领域的潜质？诚然，弹性的自律、个人意向和个人取向不是华人所独有的，而是一种常态的表达，其又完美地与后资本主义相协调。

（责任编辑 洪颖）